

佛經音義與漢字研究

陳五雲 徐時儀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佛經音義與漢字研究

陳五雲 徐時儀
梁曉虹 著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佛經音義與漢字研究 / 陳五雲，徐時儀，梁曉虹 著
— 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9
ISBN 978-7-80729-944-8

I. ①佛… II. ①陳… ②徐… ③梁… III. ①佛經—
訓詁—研究 IV. ①H131.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0)第180060號

- 書 名 佛經音義與漢字研究
著 者 陳五雲 徐時儀 梁曉虹
責任編輯 王華寶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大眾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浦口大橋北路京新村 546 號 郵編:210031
開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張 15.75
字 數 40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80729-944-8
定 價 45.00 元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25—58849828)

《佛經音義與漢字研究》序

“術”爲“邑中道”(《說文》)，“學術”猶爲學之道，而“學者體認不同，學術內涵有異”。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包括經學、小學、校勘學、辨僞、輯佚、史學、方志學、地理學、譜牒學、曆算學、樂曲學，不曾出現佛學。佛學研究漢魏六朝直至近世，頗有可觀者，梁氏却未及道。錢賓四亦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包括宗教、哲學、科學、心理學、史學、考古學、教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藝術、音樂，以宗教爲首列。事實上，佛典的研究由來已久，近世亦不乏其探究者。

現當代佛學研究決非魏晉南北朝爲求知一般佛理，而是在《玄應音義》、《慧琳音義》已有研究基礎上繼續開掘，更進一步通過佛典音義關係探求佛經的深層音義體系及文化底蘊。前人的研究成果保留在傳世的佛典書面語言裏，書面語言是用漢字記錄下來的，佛典研究自是離不開對漢字的研究，《佛典音義與漢字研究》之作的重要性當不言而喻。目前佛典研究不乏佳作，而《佛經音義與漢字研究》則是國內首部佛經與漢字綜合研究的專著，不可多得。特別是與佛典相關的漢字情況十分複雜，常超出一般人的見識。是書立足於佛典與漢字前沿深入透視，對手頭字、訛字、借字、專造字、俗字等列例詳明，剖析精到，使漢字與佛經音義研究相得益彰。

該專題的研究也取決於漢字制度的認知，漢字不是綫性(形—音—義)的表音制文字，而是混合型()的表意制文字，具

體說來，即漢字是以象形爲基礎、表意爲主導而又兼有表音成分的外表意制文字。這一表意制度（體系）的文字，構形有繁簡和異體、體態有篆隸真草，體態之異又與使用工具（刀、漆、紙、筆）及制作（模鑄、制版、印刷）相關連。遠在佛典傳世之前（先秦）用刀、漆，刀刻成綫條易而圓轉難，竹桿點漆書寫，竹硬漆膩寫不成行，必形成蝌蚪狀，用筆蘸墨書寫，或帛或紙，真草方有可能。文字的實用性與書法的藝術性也達到完美的統一。至於文人筆下增益點畫，以異炫博，當不可取，而民間爲應施用，造新字、寫別體，自是不應漠視，它不入傳世文字之“正軌”，却常出現於佛典行間，與佛經音義訓釋相涉。這是漢字在使用實踐中派生的，宜正確對待的。

“博是專的先決條件，史是論的基本保證。”本專著博參群書，充分占有資料，有效駕馭科學歷史觀和方法論，以精專爲唯一追求，極難能可貴。資料充分使有可能形成正確觀念、判斷和推理，若不以科學方法駕馭，“（資料）雖多亦奚以爲？”（季羨林《印度語言研究》）史論結合，問題才看得周全，立論有據。如若不然，可能導致目光短淺、識見隘陋、陳陳相因的結局，“出新”更是無從談起，難免像荀子所說的那樣：“沒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何成果之有！如今欣對力作，想到已往教訓，幸聞現實新知，樂不自禁，深感此作非大家莫能爲也，爲之敬佩不已。

本書作者陳五雲、徐時儀、梁曉虹（日本）諸資望教授皆受業名師，學有本原，造詣彌深，數十年來專攻語言文字之學施用於佛經音義研究，建樹豐碩卓越，真知灼見疊出，在贏得好評的累計出版近二千萬字書作基礎上又開創了佛經音義與漢字研究新格局，並爲創建包括俗文字學在內的漢字學宏構作出重大貢獻，將甚有利發蒙當代，梯梁來學。茲謹達賀忱，並特爲之序。

許威漢 2010 夏於上海師大寓所

目 錄

《佛經音義與漢字研究》序	(1)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目的與意義	(5)
第二節 研究範圍	(16)
第三節 研究方法	(31)
第二章 佛經音義的版本	(44)
第一節 佛經音義的寫本	(44)
第二節 佛經音義的刻本	(66)
第三章 佛經音義諸本與漢字研究	(94)
第一節 寫本佛經音義與漢字研究	(94)
第二節 刻本佛經音義與漢字研究	(160)
第三節 寫卷和刻本佛經音義與漢字研究	(164)
第四章 佛經音義字形研究專論之一——傳承字	(170)
第一節 傳承字述評	(170)
第二節 佛經音義中的正字	(177)
第三節 佛經音義中傳承字的作用	(202)

第五章 佛經音義字形研究專論之二——手頭字與訛字	(213)
第一節 手頭字	(213)
第二節 訛字	(247)
第六章 佛經音義字形研究專論之三——借字與譯經專造字	(278)
第一節 借字	(278)
第二節 譯經專造字	(298)
第七章 佛經音義與漢字形體演變探源研究	(328)
第一節 “六書說”概要	(328)
第二節 “六書”以外的現象	(332)
第三節 “俗字”和俗文獻	(343)
第四節 佛經音義俗字所反映的漢字字形演變的幾種主要 方式	(356)
第八章 佛經音義與漢字形體演變研究	(373)
第一節 佛經音義與漢字字形演變	(373)
第二節 佛經音義俗字形體辨析	(381)
第三節 佛經音義俗字形體演變的理據	(408)
第九章 佛經音義有關文字的術語研究	(414)
第一節 與俗字相關的術語	(414)
第二節 與正字相關的術語	(440)
第十章 佛經音義與漢字史研究	(446)
第一節 佛經音義與《說文》	(453)
第二節 佛經音義與其他字書	(459)

第三節	佛經音義與民間用字.....	(467)
第四節	佛經音義與中古漢字.....	(472)
第五節	佛經音義與敦煌文獻用字.....	(477)
第六節	佛經音義在漢字史上的貢獻和地位.....	(482)
參考書目.....		(485)
後 記.....		(494)

第一章 緒論

周有光說：觀察文字的性質，可以從三種不同的角度著眼：語音角度、符形角度和表達法角度。三種角度觀察到文字的三個側面，叫做文字“三相”。又：同一種文字可以從不同角度作不同的說明。例如，中文（漢語漢字）從音段來說是“語詞・音節文字”，從符位元來說是“字元文字”，從表達法來說是“意音文字”。由於表達法是“三相”的中心，一般用表達法來概括其他二相。^①

漢字系統，從時代上劃分可以用分為若干個階段，我們把它粗分為三段：早期、中期和現代。早期即小篆之前，或稱為古文字系統；中期，指隸書系統，即由漢代的隸書一直到文字改革前的整個文字應用系統；現代即指現代漢字，為以簡化字為中心的常用漢字系統。這三個系統，從書寫方法上看，可以有這樣的區別：古文字系統一概是手寫的，其傳播手段只能是抄寫，我們可以因之而稱其為“手寫字系統”；隸書系統的文字，自有了傳拓技術的發明和印刷術的應用之後，傳播手段有了極大的改變，傳播效率也得到了提高，因而我們可以用把它稱為“手寫—印刷字系統”。現代漢字雖然不排斥手寫，但它是建立在以印刷物為規範的基礎上的，傳播手段可以說是迥然不同於前代，書寫時也已經有了更高效率的打字機、電腦等，在操作上必須遵守一定的規範，我們因此稱它作“印刷

① 周有光《文字三相說》，《民族語文》1989年第3期；又見周有光《世界字母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14—15頁。

字系統”。^① 這樣的三個系統，實際是一個總系統中的三個連續體，它們當然有着相互間的聯繫。

早期的古文字系統即“手寫字系統”，由於文字的書寫出於手工，加上文字的發展和語言發展的不同步，文字形體的變化受制於書寫者和書寫內容及閱讀者之間的約定，這種約定的範圍有限，其“傳之永遠”的能力也一樣有限，因而，古文字的形體的多姿多彩便成了必然。真正有效地達到“統一文字”，在當時，一需要有强有力的統一政權的管理，二要有統一的被廣大學者所接受的理論。因此，秦始皇帝建立的“書同文字”的制度，以小篆為官方文字的標準文字，為古文字階段的終結；而直到東漢許慎纔完善的“六書”理論，則成為古文字（主要是小篆）的文字構造理論。假如我們相信“六書”確實是漢字構造的基本理論的話，也只是指小篆系統的構造是符合“六書”並與傳統語言學相一致的。這一時期的文字有非常多的變體，（我們所稱的“變體”是指所有的字形，包括“正體”在內，因為“正體”往往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而是從眾多變體中選出來的。）這並不希奇，因為這一時期的書寫者往往都有造字的權利，

① 我們提出這樣三個系統，早期與中期的分界依照“隸變”為界，這是傳統的作法，但這也有一個好處，即與公認的時代相合，事實是，隸變確實可以看作“古今”文字的分水嶺。而我們祇是採用“書寫方法”作為標準，也得到了同樣的結論。我們把中期與現代的分界定在簡化字公佈前後，理由是，在文字演變史上，現代簡化字的確立確實是一件大事，這樣的大事件往往是作為分界的標識。（把隸變作為早中兩期的分界，也是以秦統一文字這一大事件作為標識的。）其次，把目前還在很多地方使用的繁體字歸入中期“手寫—印刷字系統”，是因為繁體字早已存在，與隸書以來的文字系統有著明顯的繼承關係，其與簡化字系統的傳承前代文字系統在性質上有所不同，因為簡化字的出現，不僅僅是精減了筆畫和字數，還在於其記錄的是以口語為主的現代普通話，是口語化的書面語形式，而繁體字更適於記錄以單音節詞為特點的文言文（即傳統書面語）。儘管現在繁體字同樣也進入電腦，正如經過技術處理，甲骨文金文也一樣可由電腦書寫，這與所謂“現代漢字”的概念並不完全一致。因而我們把現代漢字定義為“以簡化字為中心的常用漢字系統”，而與之相應的繁體字可以看作前一階段文字的延續。

只是他所造的字擁有多少認同者，是決定該字歷史地位的關鍵。

隸書系統即“手寫—印刷字系統”，包括傳統所說的漢碑隸書、簡牘草書、章草、八分、真書、行書乃至宋體（明體印刷字）等。這是一個包容量大，體態豐富的文字羣體。由於書寫技巧的演變，使得本來已經選定的“正體”在書寫中逐漸變得形體方正起來。這一“方正”的特點是，一、漢字失去了圖畫式的“象形”特徵；二、獨立的圖形可以分解為若干“筆畫”；三、這些筆畫各具具體，並獲得了自己的稱名；四、文字結構內部的“理據”得以減弱，而文字組成部件的象徵意義更加抽象。這一變化，在漢字書法的研究中得到了理論上的歸納，“永字八法”便是其成果之一。另一方面，由於書寫速度決定了文字記錄語言的效率，草書便是為適應這一需要而出現的。這種對速度的追求，也同時會對舊字形系統造成破壞。這在以手寫為主要書寫方式的時代，尤為尋常。因而，草書（或稱“草體”）除了在書法學意義上作為一種重要的書體存在，基本被排除在“正體”之外。然而，這種書體的存在，却無時無刻都不在影響著“正體”的發展。唐蘭說：“書寫體本是永遠流動的，小篆定了，就產生隸書，隸書定了，又產生正楷，正楷定了，又產生簡俗字。”^①

同樣，在“手寫—印刷字系統”中，手寫體具有某種或然性：手寫體會因人而發生字形的譌誤、繁衍或帶有個人的風格特徵。印刷字則因刻本是由刻經者是在書手的繕寫後而刻字印刷，因而又受到書手書寫的影響和刻字人的可能的譌誤造成的變異。

“印刷字系統”是指俗稱“宋體字”或“明體字”的專用於印刷用字，以後發展為印刷活字。有意思的是，早在北宋時代，便已有了匠人畢昇的泥活字的發明，但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國依然習慣於刻版印刷，這可能與活字材質與成本的因素相關。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由於活字印刷的影響，漢字尋得了約減字形總數的可能。隨着

① 唐蘭《中國文字學》，105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

時代的變化，今日之電腦輸入用字，皆當屬印刷字系統之流亞^①。

印刷字系統的產生和它的應用，對漢字字形的改造和規範，起了極大的作用。尤其是活字印刷，因其每個字都能反復使用，從而減少了異體字的使用，提高了文字個體使用的頻率，從而也使文字字數的限制得到了相當的節制，由此，也強化了對“正字”的認同。

由於表達法決定了文字的性質，所以周有光先生的“意音文字”說逐漸為人們認同，儘管這種認同帶著某種程度的保留^②。我們在對佛經音義文字研究時，採用寬泛的“意音文字”的說法，也是為方便說明漢字演變過程中種種現象，而並非認定哪一種關於漢字性質的研究結論是唯一的標準。^③

① 事實是印刷字的發端即為楷書，被稱作“宋體字”或“明體字”的印刷字是由刻字工人的刻字技巧造成的字形改造。而印刷術的發明，又並不限定某一種書體作為印刷用字的專利。凡是結構勻稱，字形大小一致，利於雕刻或利於排版的字形都可以用於印刷。“宋體字”或“明體字”作為印刷字的代表，正是由於它能有效地符合清晰和整齊這兩個起碼的要求而獲得了首選。

②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中說：“我們對漢字性質的看法，重點放在分析漢字所使用的符號的性質上，因為一種文字的性質就是由這種文字所使用的符號的性質決定的。在於究竟給這種性質的文字體系安上一個甚麼名稱，那只是一個次要問題。”（10 頁）又說：“漢字在象形程度較高的早期階段（大體上可以說是西周以前），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嚴格說應該稱為借音符）的一種文字體系；後來隨着字形和語音、字義等方面的變化，逐漸演變成爲使用意符（主要是義符）、音符和記號的一種文字體系（隸書的形式可以看作這種演變完成的標志）。如果一定要爲這兩個階段的漢字分別安上名稱的話，前者似乎可以稱為意符音符文字，或者像有些文字學者那樣把它簡稱為意音文字；後者似乎可以稱為意符音符記號文字。考慮到後一個階段的漢字裏的記號幾乎都由意符和音符變來，以及大部分字仍然由意符、音符構成等情況，也可以稱這個階段的漢字爲後期意符音符文字或後期意音文字。”（16 頁）商務印書館，1988 年版。

③ 傳統說法認為漢字是表意文字，應該說也是一種可以認同的觀點，且稱說似乎也很方便。我們在本書中往往會引用傳統的諸家說法而不作一一辨正，正是取其合理的一面。

第一節 研究目的與意義

文字的書寫系統包括三個方面的因素：文字符號，文字載體，文字書寫工具。其中，文字符號的產生有着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而文字載體和書寫工具的演變則對文字符號的演變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在文字載體的演變史上，紙的發明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項發明。中古漢文獻的傳播，無不因紙這一載體的創造而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紙不僅用來書寫文件，也用以傳拓和印刷。因紙的出現而引起了書寫方式的變化，使中古“手寫—印刷字系統”成為可能和現實。同樣，由於印刷術的產生，也因之而出現了字體的革命——印刷體，而印刷體則為更多的人掌握文字提供了方便，然其意義不僅於此，印刷體還成為事實上的文字規範的樣本，唐蘭說：

此外，近代文字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隸書、草書、楷書，都有人做過搜集的工作。楷書的問題最多，別字問題，唐人所釐定的字樣，唐以後的簡體字，刻板流行以後的印刷體，都屬於近代文字學的範圍。西陲所出木簡殘牘，敦煌石室所出古寫本經籍文書，也都是極重要的材料。^①

他又說：

書寫文字，人人都不不同，所以文字用的時代略久，就容易混亂。漢末的隸書石經，唐代的正書（也稱為隸書）石經，目的固然在統一經文，也可以統一字體。書寫體本是永遠流動的，小篆定了，就產生隸書，隸書定了，又產生正楷，正楷定了，又產生簡俗字。

可是，隸書出，篆書跟著就廢棄，正楷通行，隸書也就不用了，而正楷卻一直流行到現在，簡俗體並不太流行。這是特殊的。我以為歷代政府都願意支持正楷，雖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印刷術的發明跟進步，也足以使正楷體容易固定。

① 唐蘭《中國文字學》，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一版。

印刷體和書寫體，有時是有歧異的，例如“曾”字就有幾個寫法。可是無論如何，印刷體總還可以作標準用的。書寫體是藝術的，但印刷體是實用的，所以“印刷體”在文字學內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①

中古的“手寫—印刷字系統”包括著這樣一些形式：手書，石刻文字，傳拓，木刻印刷，活字印刷。其中，手書和石刻文字是傳承了早期手寫字系統的，與前代不同的是，此時的手寫文字已進入隸書和後隸書時代，用以結構字形的基本筆畫遠比早前的古文字複雜，在書寫技術上也遠高於前代。^② 有意思的是，由魏晉到唐宋，此階段的漢字一方面是大量產生，一方面卻又走向了相對嚴格的規範。這一現象，正可以成為荀子所說“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③的注腳。出現這樣的現象，外在的原因是，魏晉時期以及其後的南北朝，政治上的分裂造成了文化上的多元，北方長期被胡人統治，卻又受漢文化的浸淫，形成了胡漢雜交的文化現象。東晉之後，南方雖然號為“正統”，但外來的文化如佛教也長期佔著十分顯著的位置。事實上，在此南北對峙的時期，僧人交往和活動卻是十分頻繁的。我們隨手拾得的典型例子就有，北方，至今還完好保存着的雲岡石窟、龍門石窟等佛教文化的寶庫。而南方，則我們不會忘記“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名句。也就是說佛教文化在此時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由西域傳入的佛經迅速漢化，並經無數信眾的鈔寫得以廣泛傳播。這種文化傳播的方式，顯然給漢字這種表意體系文字的使用帶來了壓力。從而也給漢字帶來某種意義上的革命，如反切方法的發明和流行，以及對漢語聲律的講究和應用。當然，在文字上的最明顯的表現則是大量俗字的出

① 唐蘭《中國文字學》，121—122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新一版。

② 楷書是在隸書的基礎上，吸收了草書的技法而形成的一種規範書體。“永字八法”的形成，標志着楷書技法和理論上的完成。

③ 《荀子·正名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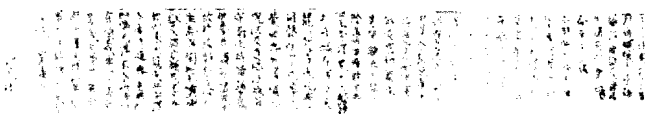
現並傳播。^① 此外，雕版印刷的發明，似乎也是為傳播佛經纔得以成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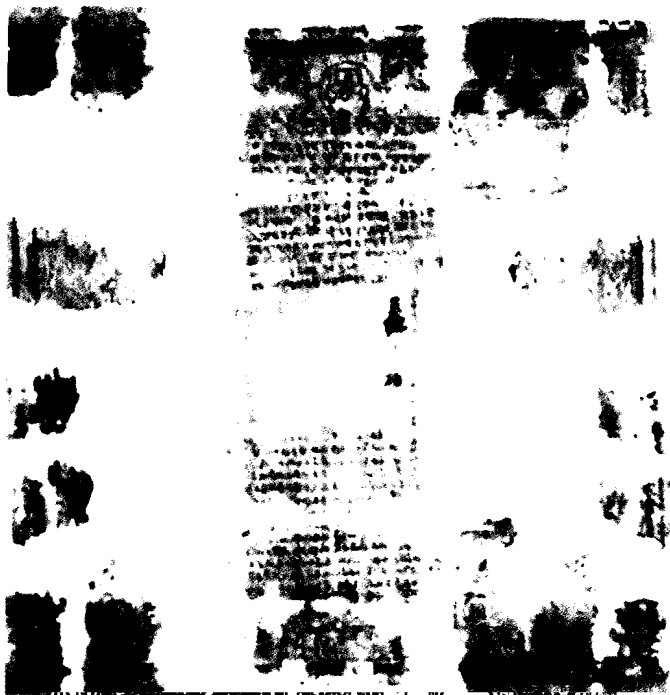
《金剛經》局部圖片^②

① 晚清康有為提倡“碑學”，認為“窮鄉兒女造像”“皆有異態”。所謂“碑學”正取諸北朝的碑刻。而碑刻中不乏“別字”，自羅振玉、羅振鐸集《碑別字》以還，集碑別字者還有馬向欣《六朝別字記》、秦公《增廣碑別字》和秦公、周大新《廣碑別字》，所得並多。

② 唐朝後期，印刷實物有明確日期保存下來的，是一卷《金剛經》，其末尾明確刻著“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價為二親敬造普施”字樣。咸通九年即西元 868 年，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確日期的印刷實物。該實物原藏于甘肅敦煌千佛洞，1899 年在洞中發現，現存英國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該書呈卷子形式，全卷長 4877 毫米，高 244 毫米，卷首的一幅扉畫是釋迦牟尼在祇樹給孤獨園的說法圖，其餘是《金剛經》全文。該書雕刻非常精美，圖文渾樸穩重，刀法純熟，說明刊刻此書時技術已達到高度熟練的程度，書上墨色濃厚均勻，清晰明顯，也說明印刷術的高度發達，而且印刷術發明已久。



現存韓國慶州博物館的唐早期印刷品《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



現存最早的梵文印刷《陀羅尼經》殘片(西安出土)

現存最早的印刷品，幾乎都與佛經的傳播相關，這似乎可以解釋為因佛經傳播巨量的需要而促使了印刷術的產生。而由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大量抄本，又幾乎都與佛教相關，而敦煌遺書時代的上下限正是從北朝至元，其間經過了兩次俗字大流行的高峰（前一次在魏晉南北朝，後一次在唐末五代）。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次俗字

① 引自《印刷博物館》網頁。<http://www.kepu.com.cn/gb/civilization/printing/index.html>

的大流行，其實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前一次發生在漢字字體的轉型期，由隸書變到楷書正是處於此一時期，可以說是書寫技術變化與俗字的產生流行有着較大的關係。而後一次，則發生於唐末五代，固然在政治上沒有統一的强有力的政府是一個重要原因，但俗字流行的主要文獻多為佛教經籍，這不能不說宗教文獻對俗字流行產生了影響。事實上，自顏之推提倡的“是正文字”的運動起，從一開始就把“是正文字”的重點放在儒家文獻上，這種以儒家文化為中心的做法，是中國歷代統治者一以貫之的。顏之推說：

世間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牙有同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為專輒耳。考校是非，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丘”，《說文》“尸”下施“几”：如此之類，何由可從？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召為邵，以閒為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旁為“舌”，“揖”下無“耳”，“龜”、“鼃”從“龜”，“奮”、“奪”從“萑”，“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經”旁，“皋”分“澤”片，“獵”化為“獺”，“寵”變成“寵”，“業”左益“片”，“靈”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強改為別；“單”字自有善音，輒析成異：如此之類，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①

同樣，顏元孫在《干祿字書》中也明謂：

且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真。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春早去甚，使輕重合宜。……其有義理全僻，罔弗畢該；點畫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干祿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為次（每轉韻處，朱點其上），具言俗、通、正三體（大較則有三體，非謂每字總然）。偏旁同者不復廣出（謂“念、爰、

^① 《顏氏家訓·書證篇》。